

■ 历史·文化研究

试论“三不朽”思想对曹丕曹植兄弟的影响

蒲二利

(郑州大学 文学院, 河南 郑州 450001)

摘 要: 三不朽思想的提出,为古代士人树立了人生价值目标,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曹丕和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,对“三不朽”思想的接受各有偏重,纵观他们的一生,三不朽的影响贯穿始终。

关 键 词: “三不朽”;曹丕;曹植;影响

中图分类号: K235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1012(2008)01-0169-03

儒家的“三不朽”,对古代士人的影响极大,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,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创作观。汉末至魏晋这一时期,社会动荡不安,政权更迭频繁,原有的社会思想体系也被打破,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面临威胁。然而它对文人的影响仍不可忽视,儒家的理念在文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,即使在魏晋时期也是这样的。

一 “三不朽”思想

最早谈到不朽的是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。《国语》中记载叔孙豹说“其身歿矣,其言立于后世,此之谓死而不朽。”^{[1] P453-454}他开始认识到,假设一个人的观念或者言论流传下来,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将会长存,也就意味着死而不朽。关于这个言论,更详细的描述出现在《左传》中,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记载了范宣子和叔孙豹的一段对话:“穆叔如晋,范宣子逆之,问焉。曰:‘古人有言曰,死而不朽,何谓也?’穆叔未对。宣子曰:‘昔句之祖,自虞以上为陶唐氏,在夏为御龙氏,在商为豕韦氏,在周为唐杜氏,晋主夏盟为范氏,其是之谓乎!’穆叔曰:‘以豹所闻,此之谓世禄,非不朽也。鲁有先大夫臧文仲,既没,其言立,其是之谓乎!豹闻之,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虽久不废,此之谓三不朽。’”^[2]

(P1037-1038)

在这段对话中,叔孙豹否定了贵族的所谓“不朽”观,指出世代受封是世禄,而非不朽。他认为,真正的不

朽表现在三方面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要有明显的社会价值,而非个人得失和家族兴衰;更注重的是精神影响,而非物质利益。

叔孙豹提出的“三不朽”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,后来又经孔子阐发成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,进而成为中国传统生命价值观的主导思想。“三不朽”思想在提出时就已经划定了明显的层次,首先是立德,然后是立功,最后才是立言,把立德放在第一位,突出了德行的的重要性。因而古人在评价文人的成就时,总是先看文人的德行,品行高尚的文人才会被世人所推崇。司马光有一段话,表述出了“德”对一个人的重要性:“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……是故才德全尽谓之‘圣人’,才德兼亡谓之‘愚人’;德胜才谓之‘君子’,才胜德谓之‘小人’。凡取人之术,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。何则?君子挟才以为善,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。”^{[3] P4-5}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约束下,古代的文人最注重的就是自身的道德修养,在创作上,也会持以谨慎严肃的态度。创作出来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,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“三不朽”思想指出,个人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,因此,立功就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。受此影响,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怀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,建功立业、驰骋沙场成为他们作品中的普遍内容。古代文人都把

收稿日期: 2007-08-15

作者简介: 蒲二利(1982-),女,郑州大学文学院2005级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。

立德和立功作为人生首要目标,立言只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。尽管如此,立言仍是文人心目中实现不朽的一条重要途径,所以在没有条件立德和立功的情况下,古代文人往往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去著书立说,创造出流传千古的佳作。正如司马迁所说:“昔西伯拘羑里,演周易;孔子厄陈蔡,作春秋;屈原放逐,著离骚;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吕览;韩非囚秦,说难、孤愤;诗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^{[4] P330}

二 曹丕曹植兄弟对“三不朽”思想的接受

作为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,曹丕曹植兄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,在人生价值的认定上与“三不朽”思想完全吻合。立德既然排在“三不朽”的第一位,说明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个标准,而一般的士人难以企及。曹丕曹植二人也就只以立功和立言作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标准。不敢言立德,是出自文人的谦虚,在行动上,却要以德为标准来约束自己。儒家固守着严格的伦理秩序,遵守着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的教条,始终奉行“父慈子孝,兄友弟悌”等道德规范,孔子的思想是“仁”,即广泛的爱,这说明孔子要求建立一种既有严格秩序,又有“博爱”特性的人道关系。从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看,曹丕在德行上显然没有曹植可令人称道。曹丕对其父曹操也玩弄心机,甚至在送曹操出行时假装哭泣以邀父宠;对待兄弟,丝毫不念骨肉情分,屡次想置曹植于死地;对待僚属,更是心狠手辣,刚一当上皇帝,就下令诛杀曹植的党羽。曹丕的行为与孔子提倡的“仁”完全背离。相比之下,曹植却一直用儒家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,对曹操,对曹丕,完全出自真性情,对曹丕一直敬爱有加,即使在立嫡之争气氛最紧张的时候,曹植仍称赞曹丕“翩翩我公子,机巧忽若神”。丁廙曾对曹操说:“临淄侯天性仁孝,发于自然,而聪明智达,其殆庶几,至于博学渊识,文章绝伦,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,不问少长,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,实天之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。”^{[5] P56}这段话虽有夸大成分,但仍表明曹植在为人上甚为人推崇。

在立功上,曹丕和曹植的观点基本一致,在二人早期的诗歌中,都表现出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。曹丕在《艳歌何尝行》中借荡子妻之口指出:“男儿居世,各当努力;蹇迫日暮,殊不久留。”^{[6] P747}《令诗》曰:“哀哀下民靡恃,吾将以时整理。”^{[7] P750}曹丕的诗歌透露出,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以有限的生命为社会做贡献,立功扬名,获得不朽。曹植的立功意识更为强烈,这种意识深深的融入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中,至死不渝。曹植早期的代表作《白马篇》,塑造了一个骑马飞驰,奔赴沙场的游侠儿形象,他建功立业的愿望由此可见一斑。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,曹植明确表示:“吾虽薄德,位为藩侯,犹庶几戮

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流金石之功……”^{[8] P154}立功成为曹植最大的人生理想。即使在备受压抑的时期,其创作也处处可见这种意向的流露,如《求自试表》:“今臣无德可述,无功可纪,若此终年,无益国朝,将挂风人彼己之讥。是以上渐玄冕,俯愧朱绂。”^{[9] P368}言辞恳切,始终不肯放弃立功这个念头。曹丕曹植兄弟的强烈的立功思想,除了受儒家思想影响外,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军事家兼政治家的父亲——曹操也有很大关系,两人都曾多次跟随曹操南征北战,耳濡目染,立功的意识要比一般的士人强烈得多。

在立言上,曹丕曹植二人的观点大相径庭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^{[10] P737}在这篇文章中,曹丕将著书立说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他指出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立言扬名,永垂不朽,很显然,曹丕将立言看得非常重要,甚至有超越立德立功的嫌疑。其实这并不矛盾,曹丕身上具有政治家的特质,立功和立言在他身上可以得到完美的统一。曹丕所指的“文章”包括两类,所谓“经国之大业”,指的是诏、策、章、表、奏、议等,强调的是它的政治功用,帮助他更好地去治理国家,使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,这属于立功的范畴;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著作。在汉末动荡的社会环境里,文人的生命意识都非常强烈,生命无常,只有著书立说方能死而不朽。曹丕的这一观点,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促进了文学创作的自觉。曹植在对待立言上,观点恰恰相反。在《与杨德祖书》中,曹植说:“辞赋小道,固未足以揄扬大义,彰示来世也。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,犹称壮夫不为也。吾虽薄德,位为藩侯,犹庶几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,建永世之业,留金石之功,岂徒以翰墨为勋绩,辞赋为君子哉!若吾志不果,吾道不行,亦将采史官之实录,辨时俗之得失,定仁义之衷,成一家之言,虽未能藏之于名山,将以传之于同好;”^{[11] P154}言辞之中透露出,立功才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,设若不能立功,他才会退而求其次去立言。并且曹植认为能让人不朽的著作是史书,而不是纯粹的文学著作,与曹丕观点迥异。

三 曹丕曹植的思想与其命运的联系

在曹操的众多儿子当中,曹丕和曹植的矛盾最为突出。由于在立嫡问题上曹操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,使得以曹丕曹植为首的两个文人集团多年来明争暗斗。曹植天性率真,并无意夺嫡,曹丕却善于玩弄手段,视曹植为心腹大患。曹丕上台后,就迫不及待地诛杀曹植的党羽,压制曹植。终文帝明帝两朝,曹植的自由一直受到很大的限制,始终未获起用。

曹丕与曹植命运的不同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。上文提到,曹丕受到立德观念的影响很小,那么曹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《晋书·傅玄传》记载傅玄有一段评论指出:“魏文慕通达,而天下贱守节。其后纲维不摄,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,使天下无复清议,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。”^{[12] P317-1318}“通达”即指一个人生活随意,不拘礼节,甚至有意识地去对抗或破坏儒家礼法制度,曹丕的这种性格特点使得他做出许多不合乎礼法的事情。相比之下,曹植一直恪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,时刻约束自己的行动,无论扮演的是儿子或是兄弟或是臣子哪种角色,他都会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衡量自己的行动。在立嫡之争的过程中,曹植的党羽多次游说曹操立曹植为太子,然而,曹植却深受儒家“立嫡以长”观念的影响,不愿逾越礼法,曾对曹彰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:“不可,不见袁氏兄弟乎?”^{[13] P93}两人受立德观念的影响差别如此之大,曹丕既善于玩弄权术,又不受礼法的限制,曹植天性率真,又处处自律,所以他被曹丕玩弄于股掌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,立嫡之争丕胜植败的结果也是必然的。

在立功和立言上,曹丕偏重的是立言,曹植偏重的是立功。然而,纵观曹丕一生的表现,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为了立言。从青年时期,他就把自己定位成储君身份,从他的诗来看,“舍我高殿,何为泥中?在昔周武,爱暨公旦。载主而征,救民涂炭。彼此一时,唯人所赞。我独何人,能不靖乱?”^{[14] P40}《黎阳作》其一)言辞之中将自己比喻成救国救民的英雄,建功立业的愿望也表现得非常强烈。曹植眼中的立功,不仅表现在军事上,也表现在政治建树上。要实现自己的立功愿望,必须当上统治者。所以在夺嫡的过程中,曹丕的种种努力都基于他的立功愿望。曹丕即位后,在政治、经济等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统治,从黄初三年到黄初六年三次征吴,试图推进统一的进程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曹丕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,这些作为,与立功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至于曹丕为什么一再

表示出自己看重的是立言,当是因为他有立功的条件,可以痛快淋漓地施展自己的立功愿望,所以口头上就不提,而他此时缺少的是可以让自己不朽的著作,所以他就急切地要弥补这个缺憾。曹植重立功、轻立言也是这个原因。鲁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精辟的阐述,他说:“这里有两个原因,第一,子建的文章做的好,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,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,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;第二,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,政治方面不甚得意,遂说文章是无用了。”^{[15] P504}曹植一生都在寻求立功的机会,期望在政治上能有所成就,这在曹丕看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。曹丕具有政治家的心机,也有政治家的手腕,曹植越是热心于政治,曹丕就越是要压制他,甚至多次想置曹植于死地。曹植强烈的立功愿望造成了他后期命运的悲惨,虽然明帝曹叡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,但始终对他保持着戒备之心。曹植一生都在渴望立功,却因此影响了自己的整个人生,他身上更多的是文人气质,少了政治家的天分,一直到死,也没有机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,以致郁郁而终。

参考文献:

[1]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.国语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.
[2] 杨伯峻.春秋左传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[3] 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[4] 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[5] [13] 陈寿.三国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[6] [7] [10] [14] 张溥.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[M]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.
[8] [9] [11] 赵幼文.曹植集校注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.
[12] 房玄龄.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[15] 鲁迅全集 第三卷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.

Impact of Ideology of the “Three Eternities” on Cao Pi & Cao Zhi

PU Er-li

(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, Zhengzhou 450000, China)

Abstract: The “Three Eternities” sets a goal of the value of life for the ancient scholars and makes far-reaching implications on their fates. As the leader of Jian An Literature, Cao Pi & Cao Zhi had different bias when they accepted the “Three Eternities”, the impact of the ideology influenod their lives.

Key words: “Three Eternities”; Cao Pi; Cao Zhi; impact